

纪念《历史研究》 创刊四十周年

编者按 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许多作者、读者用题词、贺信、笔谈、论文等多种方式向本刊表示祝贺之意。对此，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刊决定，第一、二期为纪念创刊40周年专辑。本期发表一组笔谈及12篇学术论文，第二期为学术论文，其他栏目暂停。题词、贺信等，将另行出版。

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的编辑方针，执行“百家争鸣”政策，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依靠作者、读者、编者的通力合作，办好刊物，为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六封信

刘大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6年，我写的《〈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对刊物的缘起作过叙述，其中讲到陈伯达召集的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系出于回忆，没有文字依据。前两年，找到了那次会议的记录，是中宣部办公室1953年11月5日印发中央书记处及中宣部各负责人的。会议时间为9月21日，而非10月，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胡绳，而非郭、胡没有出席。列席者尚有黎澍、佟冬。记录是黎澍整理的，

文字简短。讲刊物的只有一句话：“关于历史刊物，现在有几个刊物，考虑一下，准备出一个史学界的刊物。”编委会召集人、编者等，记录中概未提及。

郭沫若写给我的信和其他手迹，有一些是与办刊物有关的。“文革”中那些信函、手迹被收缴走了，后来“专案组”退还了一部分，但已残缺不全，有的把受信人“刘大年”几个字也挖掉了，以表示敌忾。现在我手中能够找出来的郭老写的与《历史研究》有关的信和手迹还存6件。在纪念刊物创办40周年的时候，把它们发表出来，大家可以从中看到郭老对这个刊物是如何热情关怀的，也可以了解刊物创办初期的一些情况，会感到十分亲切。

这些信上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从信的内容可以知道，它们都写于1954年，也就是40年前。

1月3日，致刘大年、尹达。

刘大年、尹达同志：发刊词昨晚起了初稿，今早看了第二遍。写得不好，特别在尾巴上想不出更响亮的语句来结束。请您们尽量地删改、润色。如不可用，就只好请您们另起炉灶了。

1月4日，致刘大年。

刘大年同志：发刊词末尾一小节，如无大改动，请将“促进高潮”四字，改为“各尽所能”。

以前我讲过了，《历史研究》发刊词是郭沫若亲自写的，写些什么，我和尹达在郭老家有所讨论。这两封信使我们知道了发刊词写作的确切时间，也知道了它是作者充满激情，一挥而就的，他还注意了字斟句酌，使文章神完气足。这时大概创刊号正准备发稿。

1月7日，致刘大年、尹达。

刘大年、尹达同志：这是陈公培同志开的名字，供您们参考。

这两行字是批在陈公培提供的资料上转来的。那个资料上列有可以考虑参加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又并排写着“史学研究”、“历史研究”两个刊名。刊物叫什么，显然1月初尚未确定。郭老书写了“历史研究”四个字，这才定下来。关于这个名称后来还有一个小故事。1955年春天，苏联驻华大使、哲学家尤金访问中国科学院，潘梓年和我同他谈话。在谈到《历史研究》时，他表示对刊物名称颇有疑问。理由是“研究”一般表示学问高深，所以苏联科学院的历史刊物叫《历史问题》，他说你们叫“研究”，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他提出的疑问让人觉得苏联“老大哥”希望别人什么事都跟他们一样才对。我们只好作些解释，说明在中国文字中，“研究”并没有高深的意思。

11月3日，致刘大年。

刘大年同志：上海李平心先生去年寄我的一篇东西《居延汉简奴隶考》（似稿

又似信)，内容颇好。凡关于汉简出处，我已仔细据《汉书》校正了一遍。所引别的书籍，可能亦有误记处，我就没有工夫仔细校对了。这稿子，我觉得《历史研究》里面可以选用。另有一篇《伊尹迟任老彭新考》，我觉得太牵强了，不好。

12月14日，致刘大年。

刘大年同志：感冒大体上好了，还有点咳嗽，体温不稳定，有时高过三十七度。汪篔同志的报告看了。浦江清先生和杨向奎先生的文章都跳着看了一遍。浦文是费了大工夫的，我认为可以发表（作为一个单行本印行，也是办法）。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提供出来可让学者们继续研究。杨文，问题比较多，断定《周礼》“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很难使人信服。《周礼》和《左传》，是刘歆利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而加以改编，也窜杂了己见，大体上是可以成为定论的。

刊物早期很注意请编委和其他专家审稿。这两封信，前一封是郭老向编辑部介绍文稿，后一封是对编辑部送审稿件的回复。他对来稿或者详细核对资料，或者郑重给以评价，倾注的心血不少。评价别人的论著自然离不开自己的学术观点。12月14日的信上，认为刘歆伪造《左传》、《周礼》，那是他早年同意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使然。1937年他写的《驳〈说儒〉》强调过这个观点，认为古文是刘歆捣的鬼，1943年的《述吴起》也涉及这个问题。现代学者的研究，证明刘逢禄、魏源、康有为等今文学家断言刘歆伪造古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郭老如果在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大概也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封信上又提到“汪篔同志的报告”，报告内容为何，现在回忆不起来了。汪篔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以前做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师生情谊甚厚。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两个历史研究所时，第二所所长最初拟请这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担任，商请汪篔先往广州候视。陈以体弱畏寒，不能来北京居住，没有就任。汪回京后曾有口头报告。但此为上一年底1954年1月的事，不会在将近一年以后才提出书面报告。这封信末尾又有“在廿号左右召开一次编委会，我同意”一行字。那时编委20人，除远在外地的陈寅恪、杜国庠等人外，开会一般都能参加。每次会议郭老都亲自主持。

9月30日，致陈寅恪。

寅恪先生大鉴：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尊体健康，并蒙概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事务不多，不致影响研究工作。目前正积极筹备，详情将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尊著二种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专此，即颂著祺。此函是由我起草，经郭老修改、书就，然后发出的。郭在信稿右首写着：“信稿略有润色，已书就，望交杜守素同志转。”在我起草的底稿上，关于《历史研究》本身的只有一句话：“对《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如有指正意见，望便中示知”。郭老援笔改为：

“《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这当然不是客套一番，而是他确实不满足于刊物的质量和编辑工作。他在以一个负责人的身份作自我批评。

郭沫若这些信件，是他留给《历史研究》的财富。光大它所体现的精神，对于遵行刊物创办宗旨，发扬传统，保持自己的代表性，应该是很有益的。

郭老这六封信，除了致陈寅恪一函，五封信中有三封是写给刘大年的，另两封写给刘大年、尹达的信的开头，也是把刘大年的名字写在前面。虽然它们讲的都是《历史研究》的事，怎么没有把尹达摆在主编的位置上呢？原来正副主编是直到创刊号快要付印的时候，才由郭沫若召集范文澜、陈垣、尹达、刘大年共五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在那以前，郭老心目中一直以为我就是主编。开会头天晚上，我去找范文澜同志，告知第二天会议内容。我提出刊物主编由尹达担任，我做副主编。理由是古代史时间长，稿子多，近代史时间短，稿子少，尹达是搞古代史的，做主编适合。范老完全赞成。其实我思想上主要考虑的是郭、范对古代史分期意见不同，刊物要百家争鸣，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难免涉及郭、范关系。尹达和郭老在一个所工作，他担任主编，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避免引起别的议论。但这个考虑不好说出来，后来证明也是不必要的。第二天上午，在文津街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开会。最后一项议程是我提出请决定正副主编。郭老立即断然说：“主编当然是你啰！”我把头一天对范说的话讲了一遍。谁知郭老毫无思想准备，他顿时怫然作色，提高嗓门说：“那我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去解决吧！”陈垣老不表态，范老说了一句：“还是尹达同志当主编吧！”于是就散会了。郭老当然并不是对尹达有什么看法。尹是1953年冬由北大调至科学院的，我则原先就在科学院工作，一开始就参加了筹备成立两个历史研究所和刊物的工作。郭当时对我们熟悉的程度不同，实情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信或者写给我，或者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的原因了。

我与《历史研究》

罗尔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心读者，也是一个受益很深的读者。

回想起来，是40年前的事了。那时国务院把我调到历史第三所（即今天的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乘刘大年副所长因公赴沪之便，诚挚而热情地写了一封欢迎信，请他经南京时交给我。大年同志下榻南京史料整理处，我得讯，先去见他。见面后，我急不容待地问他：“今后还要不要考证？”我为什么有此问呢？那是前两年我到北京学习，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从万里海外投奔归来，不料对我过去做的考证工作却狠狠批判，把我当作犯了什么罪行似的。”他边诉说边哭。大年同志听了，严肃地说：“谁说不要考证！你写考证文章来，我给你发表。”大年的话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当时他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给我发表了考证的文章，《历史研究》也就成为我热爱的读物。

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给我以指导，赐我以新知，是难以枚举的。总之，我在历史学上找到方向，获得新知，《历史研究》是一个大来源，我是铭感不尽的。

我与《历史研究》还有过一件值得追怀的往事。当时史学界权威深信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是个“卖国”者。这个荒谬的说法，起于一张所谓“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的捏造，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个人干的骗局。《历史研究》发表田汝康同志《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我对田汝康同志搜集到的大量外文资料作了充分肯定，但也对某些看法和判断提出了商榷，写了一篇《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刊于1980年《学术月刊》第4期，该刊编者梁友尧同志并把该文提要刊于1980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于是取得了学术界普遍的同意，扫除了谬说。田汝康同志看了，来信表示十分欢喜，从而结下一段作者与读者相得益彰的嘉话。

《历史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张 磊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流光如驶,《历史研究》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

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刊物中,我对《历史研究》是情有独钟的。这不仅是因为我研究生时期的习作曾经发表在这份专业刊物上,更重要的是它的曲折发展过程同步于我的青年和中年——《略论蒙古1921年人民革命》一文刊载时,我方20初度,于今,则是已届花甲。做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的成长是同《历史研究》分不开的,确切地说,它是我的“良师益友”。

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历史研究》和我联结起来。我对历史科学的抉择不是偶然的。家庭氛围颇有影响,我从少年时代就喜爱文史。但在更大程度上起了促成作用的,则是我数理化课程的荒疏。我的初中时期正值共和国诞生的前夜,生活中充满着激情与战斗。1948年春天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后,便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冬天,我从北京经天津进入解放区,不久,即随人民解放军重返津门。在市军管会工作一段后,组织上安排我复学,因为我还是16岁的少年,而祖国建设需要大批建设人才。1950年秋,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创办也不是偶然的。它的问世表明,繁荣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还在建国初期就已提上议事日程。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捧读《历史研究》创刊号的欣喜之情。

40年来,《历史研究》对我的培育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修养、业务素质到学风和文风,都受到引导、熏陶。于此,无须赘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位“良师益友”使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历史研究不仅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事业。无论这门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我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尽管我的成果浅陋,但我对历史科学的矢志不移、锲而不舍的信念和精神可以告慰于《历史研究》的编者和作者。

历史科学重任在肩,毋庸置疑。

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主要在于从复杂纷

统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其实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使人们了然于过去，从而更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但这种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和凭藉于客观条件和实际因素，人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丰富多彩的戏剧。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赋予了人们的活动以理性的内涵。而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愈益深刻全面。史学的“通鉴”作用，自是越发增大。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摒弃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无愧为人类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试以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例，它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严峻的真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无论是农民战争，还是维新运动，抑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不能挣脱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枷锁，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之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经过反思和比较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旧中国的悲惨境地上升为富裕的、民主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信念，正是立于历史的必然规律之上。

历史科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无异痴人说梦。然而，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得有赖于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辨识和取舍，使之适应于时代和具有新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肯定一切也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涵有特殊的意义，它的认识功能是极其广泛的：既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的绵长过程，又横览社会生活的宽阔断面，阐明事件和人物的实质和特点，确认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由是，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分析、辨识和取舍提供了科学基础。

历史科学还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要手段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来不曾屈服容忍外来的侵略和内在的压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连绵不绝。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善于悲叹自己的命运，并且决心奋起改变惨淡的处境。长期以来，积淀深厚的崇高精神准则和价值取向，附丽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体现于人物的思想和实践。经由史学的各种形式著述的传媒，后人得以领会和继承，不仅在思想上予以认同，还在情感上蒙受感化。不言而喻，熟知此伏彼起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反压迫史绩，读过《正气歌》、林觉民等烈士的遗书、孙中山的演说……必然会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至于当代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对人们更为切近，发人深省，促人奋起。

以上所陈，只是荦荦大端。历史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当然远不只此。随着历史科

学在改革中的发展，它的多元的社会功能必将强化。

祝愿《历史研究》——历史科学的重要阵地——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为繁荣历史科学作出更多的贡献！

祝贺与希望

彭明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已经40年了。当这个刊物初办的时候，我是非常爱读的，几乎每期每篇必读。因为它不仅集中了许多名家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断刊登一些不同意见的争鸣文章。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五四运动性质等问题的争鸣，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也是很好的。毛泽东曾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页。）

1956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陪同人员认为损害了毛泽东的威信，因此上报，拟请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这位学者。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信，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就是前苏联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谢宁教授。这是我在1990年访苏时才知道的，他曾来我的住所看望并共进晚餐。当我告知他冯友兰先生逝世的消息时，他的眼眶竟然红了起来。当时他已退休了，对中国仍然很有感情。

总之，《历史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办得是相当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很浓。但到“文化大革命”来临时，这种气氛一扫而空，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竟也构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其实那篇

文章对陈独秀的估价很不充分，说“权威”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想来，确实有点好笑。当然，在那种岁月里，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十年浩劫，《历史研究》被迫停刊。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又恢复，然而它已变成大批判的专刊。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可读的了。

十年浩劫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也召唤了《历史研究》的复苏。但由于《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等刊物的陆续创办，因而对《历史研究》的文章就读得相对少了。但一些有关重要的中国现代史文章，我还是认真拜读的。我在“五四”70周年时所写的一篇主要论文《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也是在《历史研究》发表的。

总的看来，我应该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和一个并不勤奋的作者。

当《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我祝愿它兴旺发达，越办越好，特别应发扬50年代百家争鸣的精神，以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昌盛。

创新扶青是《历史研究》的两大特色

隗瀛涛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创刊40年了。40年前我正在大学学历史，至今对《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的一些文章记忆犹新。做为一名老读者，我对《历史研究》40年的成就表示祝贺，同时想借此机会谈一谈史学领域的创新和扶青问题，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特色。

创新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学是门古老的学问，同时又是长青的科学。我们所处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历史科学来回答；历史学本身也有一个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拓宽新视野的问题。一方面是开拓新领域，回答新问题，另一方面是深化和推进原有领域的研究。从这一点看，历史学的创新是永无止境的。此外，我们还处在一个各门类学科大发展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发展也给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角度和条件。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的出

现，也是历史学创新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历史学的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目前从事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就是适应史学创新要求而进行的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外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前后，在国内则是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期间才系统展开的，是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新兴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城市是古代尤其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至今，这就需要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入手，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就历史研究本身来说，城市史研究可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特征和复杂局面提供新的视角，可为目前近代史学界争议颇大的一些重大课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与创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扶青。创新总要有有人来做，历史学的创新同时也就是史学界的新人辈出。中国史学研究从古至今，大师林立，在世界史学之林是有一席之地的，如何保住这一领先地位，培养后辈力量是个关键。如何扶持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这是史学界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创新和扶青这两方面，《历史研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贡献很大。

创新是《历史研究》一向坚持的基本要求，这个起点定得比较高。近年又根据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调“刊登反映我国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新观点、新材料及探索新课题的高水平的作品”，作为中国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这个标准就是一把尺子，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很强的导向性。40年来，《历史研究》发表了大量创造性的高水平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些文章本身。

除了内容上坚持创新要求，《历史研究》还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组织和倡导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域研究的讨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以后又多次组织类似的学术争鸣。这些重大问题的持续大规模的讨论，对新中国史学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十年来，《历史研究》尤其重视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利用组织学术讨论，发表研究综述和集中刊载某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等方式，倡导和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许多新领域的拓展。就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来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取得一定影响，与《历史研究》的倡导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历史研究》一向坚持以文章质量论取舍的原则，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创刊40年来，《历史研究》为新中国史学发展培养了一代人材；今天，我们又高兴地看到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已崭露头角，活跃在当今史坛上。《历史研究》的作者群已初步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梯队，这正是中国史学繁荣的希望所在。对于这批青

年学者的脱颖而出,《历史研究》功不可没。

对于一个刊物来说,提出创新扶青的目标比较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这需要独具慧眼,需要有远见卓识,更需要有一种推进中国史学繁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十而不惑”,《历史研究》历经40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长成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我祝愿《历史研究》能继续发扬创新扶青的好传统,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历史知识的提高和普及

——贺《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

何兹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创刊已40年了,时光真快,创刊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却已40年了。

《历史研究》创刊之初,成立过编委会,我不是编委,是特约编委。当时的编委,如范老、侯老、翦老等,很多都已作古了。特约编委,北师大似乎还有罗志甫、刘启戈。他们两位也不在人世了。人世沧桑!特约编委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来说仍是愿作的。1950年,我是斩断和国民党的关系,斩断学术界和《食货》的关系,抱着爱国热情回国的,但思想深处确实也有历史包袱。《历史研究》能让我作特约编委,我理解为史学界领导并不见外,我自然是十分高兴的。这是我和《历史研究》的历史关系,将来为《历史研究》作史,不要忘了这一笔。

40年来,《历史研究》为历史学的繁荣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成为我国最有权威的杂志,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一定的质量,被史学界看重,成为各地评职时的重要参考。

我向《历史研究》40华诞祝贺!四十,已是不惑之年。不惑,就是什么事都懂,什么事都明白,谁也欺骗不了他。能够不惑,是了不起的。

对于已到不惑之年的《历史研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有几点想法,说说请参考。

一、有计划、有设想地引导讨论历史研究领域里一些重要问题、关键问题。

解放后的前一时期,史学界讨论过一些史学问题,包括理论的和史实的,如中国

社会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曹操评价问题等。其后沉寂了一个时期。文化革命后，历史学很活跃，思想很解放，大胆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几年，却又沉寂下来。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政治、思想、文化一切都会变。一个文化高潮，迟早会出现。对此，《历史研究》如何迎接，如何推动？凡事预则立。对历史研究领域里出现什么问题，向何处发展，应研究，应引导，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二、有理想、有计划地组稿。稿的来源，主要自然是靠投稿。《历史研究》的学术地位，能够吸引质量最好的稿子自动投来是没有问题的，但仍须有安排、有计划、有理想的组稿。这样可以加强刊物和学者间的联系，可以提高稿子的安排组合，也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历史研究的方向。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似可对全国史学界的情况，有所了解。哪些学者在做哪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深度如何，摸摸底，心中有数。对历史研究方面的老、中、青尖子户，都有个底。这样对组稿约稿，也有了基础。

三、提倡有理论、有史料，有宏观、有微观的辩证的研究风气。文化革命时期，学生批判教师是“只拉车不看路”，意思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服务。当时的政治意义，当然是错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却在做学问方面。我从这句话引申，路就是宏观，拉车就是微观。做什么学问都应当有宏观又有微观。不能拉车不看路，也不能光看路不拉车。可以说宏观是哲学，微观是科学。历史学，要有宏观又要有微观。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史料。40年来，这种风气也在逐步形成，但仍应引导。倡导这种风气，不妨旗帜鲜明些。

就此机会，我也想对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说点想法。

历史学有两个任务，一是提高，一是普及。提高就是提高对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人的认识逐步向历史真实靠近。当然绝对真理是永远不会认识的，但人类认识的相对真理，是一步步提高，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的。因此，人要坚持真理，又要能接受新事物。如荀子所说，要“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样讲的。

人类对客观实际认识越高、越清楚，智慧就越高。民间小说说刘伯温能掐会算，前知八百、后知八百，其实大约他学过历史，懂历史发展。历史知识给他智慧，使他高明。

提高总是少数人之间的事。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搞历史高深研究工作，最多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大约也差不多了。而需要历史知识的人却是整个民族。我们需要全民族都有智慧、有文化。我们常说，提高民族素质，提高民族文化修养，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历史知识。旧社会，谁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谁的“智谋”就比他周围小社会中的别人高，遇到问题别人就会向他求教，他也就会用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来的智慧给别人出主意。他就是一方有文化的“圣人”。我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旧社会民众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历史知识在民族

文化素质中所起的作用了。

落后是愚昧、动乱之源，看看现在的世界就可明白。愚昧、动乱、内战、自相屠杀的地方，都是落后的地方。愚昧使人不懂道理。

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随之而来的必是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使我们民族有文化、有智慧，文明起来。普及历史知识，迟早会被认识到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建设时代，科技是重要的，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也不能忽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掐指一算，前知八百后知八百，固然是“神话”，但没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政治家犯个错误（不按历史发展规律办事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就会使累年建设毁于一旦，变成废墟。不按历史规律办事，就会受历史惩罚，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

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这是历史学的任务。

《历史研究》，任务是提高，不是普及。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大谈普及，似乎是把话拉远了。说远就远，说不远也不远。《历史研究》应有点“包揽”历史任务的雄心和魄力。自己不能做，但可以提倡，可以呼吁，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长远任务。

坚守阵地 必有所获

张芝联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笔者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于1957年开始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到1958年，共写了十几篇，内容都是介绍西方国家和原苏联史学的新书和学术动态，期冀对发展我国史学有所启迪、帮助。1956年8月间，我有机会随翦伯赞、夏鼐、周一良三位史学家到原苏联、法国参加一些会议，结识了不少汉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了解到一些国际史学发展的新情况。当时我国史学家和外国史学家来往很少，对国际史学组织、各种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著作、新发现的史料、新出版的刊物，以及史学界争论的问题，知之甚微。有鉴于此，《历史研究》编辑部约我写稿，从此我与

《历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因种种原由，关系曾一度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关系又得以恢复，而《历史研究》的外国史部分也大为扩充，远非创刊初期的狭窄篇幅可比，尤其是世界史的文章质量显著提高，这是应该大大庆贺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外国史研究主要是为中国史研究服务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第一，既然承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从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外国史的研究成果必然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者开阔视野，加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了解。第二，从总体上看，部分中国史研究者不谙外语，读外国史籍不多，这是因为受专业所限，但他们还是希望借鉴外国史的研究成果的，所以无论从史料、史实或方法论角度看，都有参考价值。近年来有不少中国史学家运用外国史学研究方法、概念、术语来剖析中国史中的一些问题，收获颇丰，就是最好证明。第三，现在人们喜欢谈比较史学，这是一门最难攻的学科，不论是比较两种文明、两个时代、两种制度，以至两个人物，如不精通研究对象的双方，既知己，又知彼，光凭表面现象牵强附会，东拉西扯，在我看来，即使文章写成洋洋万言，也是毫无价值的。在这方面，中国史研究者如能和外国史研究者通力合作，互相学习、补充，其研究成果必定远远超过“单干户”。为此我建议，《历史研究》作为史学界的共同刊物、高层次的刊物，在这方面不妨倡导一下或者试试。

当然，中国史、外国史都各有其研究领域、对象和选题，有其独立开展研究的必要，因而也就决不是仅仅为谁的研究服务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世界史研究进步很大。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中外史学家所称道。比如，《历史研究》及其他史学刊物所发表的有关西欧封建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世界现代化进程问题、西方国家政治制度问题、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评介，等等，已经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国内不少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因此而被邀请去国外讲学、或作为访问学者，与外国史学家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和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凡立志研究外国史的人，基本上是以学生身份去国外的。所以我要说，《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史学刊物越来越多地刊登世界史研究论文，为提高国内世界史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沟通中外史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中国学者有能力，也有志气，在外国史研究这块园地上种出自己的花朵。

最后我要说的是，对那些原本研究外国史并颇有前途的、目前尚在国外的留学生，为了餬口或其他原因而不得不改学、改教中国史，甚至投笔从商，我虽然表示同情或理解，但又深感遗憾。研究历史的人本来为数不多，研究外国史的人更少，在目前市场经济冲击波下，可能还要少。但我以为，这恐怕是暂时的，也是不正常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特别是对外开放和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将会需要相当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专攻外国史的专家和学者。记得西方国家有位先哲说过，“历史

使人明智”。这里我要补充的是：既熟悉本国历史，又懂一点外国史者，会更使人明智。不然，怎样去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对我们有用的、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又怎样去尽快地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此，我想借《历史研究》一席之地，力劝国内外的史学工作者：“风物长宜放眼量”，坚守阵地。

多年前，我为一名博士生的论文写了一篇短序，其中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去鼓励他：“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在庆祝《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我仍愿用同一句话与史学界同行共勉。

《历史研究》杂志与孙中山研究

陈锡祺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

在《历史研究》杂志40岁生日之际，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谨表示衷心的祝贺。

40多年来，我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由于身在广东，任职中山大学，所以对孙中山研究尤为关注。我国史学有重视人物研究的传统，对中国近代史来说，孙中山是一位特别值得研究的人物。他虽然只活了59年，但他却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经历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的探索、思考和奋斗的历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学习历史遗产的号召，说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孔夫子和孙中山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位历史巨人。他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是一种极为精辟的概括。因此，孙中山研究，自然是历史研究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有的同志说，近年来，孙中山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及受社会关注的程度来看，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确实难与孙中山研究比拟。《历史研究》杂志对孙中山研究是重视的，仅1990年到1993年第5期，就发表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文章16篇，可见，《历史研究》杂志近年更是把孙中山研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由于孙中山研究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受到高度重视，又由于在我国学术

研究信息往往未能及时交流，所以，已发表的数以千计的研究孙中山的论文中，课题重复的也有，学术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但是，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的几十篇研究孙中山的论文，都是言之有物的独立研究成果，或论述深刻，或发人所未言，都予我很多启发。这几十篇研究孙中山的文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研究》杂志的学术水平。

当然，由于各人掌握的史料及对史料的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方法各异，学术观点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对《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孙中山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所有的文章都有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例如，80年代先后刊出的几篇关于孙中山早期思想与活动的论文，观点各异；但无论从史料分析到提出论点，都有新意，可以使我们对兴中会时期的孙中山获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其发轫时期的特点有更多的认识。

《历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有的作者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有的则是近年才活跃于史坛的青年学者。几篇青年学者写的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都颇有生气。《历史研究》杂志是体现我国史学研究水平的刊物，能不拘一格，奖掖后进，促进人才辈出，这是件好事。我注意到，近年来，青年学者的文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历史研究》杂志上，这是我国史学界后继有人、充满希望的标志之一。我曾和一些很勤奋、很有才华的青年人共同研讨有关孙中山的学术问题，我深深感到，孙中山研究也如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今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批立志献身学术事业的青年人身上。老一辈的人，还有学术刊物的主编、编辑，都应该不断创造条件让新生力量及早脱颖而出。

再回头谈谈孙中山研究的问题。这几年，不时有人和我谈及：孙中山研究不仅在我国（包括海峡两岸、港澳）受到重视，在外国也出版了不少颇具学术水平的著作。现有的成果既然如此之多，孙中山研究又将如何深入呢？我的想法是：目前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成果确实很多，但还不能说，对这位体现了一代中国人奋斗历程的历史伟人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已取得的成果，只是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日后的研究有一个更高的起点。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以往我们对孙中山晚年联俄的研究，较多依据中文史料。前几年，马林的一批档案翻译成中文出版，就使我们对联俄的背景和其中的曲折增加了很多认识。听说已有学者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俄罗斯收藏的有关档案了，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披露，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前因后果，将会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里我只是随手举一个例，目的是说明孙中山研究不仅有深入的必要，也有深入的可能。这几年《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的十几篇研究孙中山的论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因此，在孙中山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完全没有自满或固步自封的理由。

这几年，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关系，我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多读书了，但《历史研

究》杂志仍是每期必读的，而其中研究孙中山的文章更是每篇必认真去读。我希望，今后《历史研究》杂志对孙中山研究继续做出支持，发表更多有新意、高水平的文章。

《历史研究》鼓舞了我的中国 海关史研究

陈诗启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教授)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以后，我的研究工作几乎和它结了解之缘。

在《历史研究》创刊的第二年，我青年时期的习作《明代的工匠制度》得到它的采用，刊登于1955年第6期。这篇文章标志着我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开端。1959年，我的研究方向由明代经济史转入近代经济史。当年的《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生长》。这是我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开端。《历史研究》对我的研究成果的发表，鼓舞推动了我每一阶段的研究工作。

从1954到1959年是我的研究春天。其后，阶级斗争一天天地加紧，全国呈现着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凄煞景象：紧接着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72年冬，一阵狂风骤雨突然把我打进暗无天日的深渊，看来永无翻身之日。眼看着大好时光受到无情的摧残，而篡改历史的文化专制逆流到处泛滥，不胜愤激。我不甘心宝贵年华淹没于滚滚黑流，决心咬紧牙根，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力争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当时，我无法估量我的厄运将持续到何时，我得搞个内容广泛、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以便持久奋斗。我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模糊地体会到中国近代海关问题，内容庞杂，影响和作用很大；在学术领域中是一片荒漠，很有开拓的必要。我确定以中国近代海关史作为我持久的研究课题。

课题确定之后，立即率同全家大小，根据各自的能力，选摘、抄写、校对、翻译有关资料。经过六七年的默默工作，虽然遇到无法言宣的艰难险阻，终把多年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集成《中国近代海关史资料》一册，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写论文。1980年春，我写出了《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的几个特点》，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部

审阅了我的文章之后，当即给我写了回信。回信极大地鼓舞了我的研究，成为我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的动力，我至今还珍藏着它。由于我的研究受到重视和热情支持，而且明确表示有意提倡。因而增强了我的研究信心，我决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但是，按照我当时的水平，我确实写不出信中所要求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我却写出了中国近代海关一篇阶段性的文章，即《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这篇论文刊载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985年，我在深入接触海关档案之后，感到海关的历史涉及关税史、对外贸易史、内债史、外债史、金融史、港务史、航政史、邮政史、军事史、教育史、外交史以至对外关系史等等。海关史的内容如此庞杂，海关档案又是浩如烟海，要完成这项研究任务，绝非个人能力所能办到的。为了进行分工合作、综合系统的研究，我觉得非设立研究机构不可，因而倡议中国海关学会和厦门大学合办“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终于1985年11月成立，经费和人员问题大致解决。中心工作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鉴于近代海关是英国控制下的国际官厅，它和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各国外交部都保存了大量有关海关的档案资料，回国的海关外籍人员也有许多有关海关问题的记录、信件、文件；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海关问题的也不乏人，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交流有关资料、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因有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想法。1988年我们倡议香港大学举办首次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王赓武校长欣然俯诺。我曾就举办首次研讨会问题征求《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意见，很快编辑部就回了信，并提供了宝贵意见。这封信不但坚定了我举办国际研讨会的信心，而且加深了我对中国近代海关史和中国近代史密切关系的认识，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1989年12月上旬，《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几位同志赴汕头筹备第四届洋务运动史讨论会，途经厦门，看望了我。我希望借着《历史研究》的火车头作用，带动海关史的研究，建议他们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二次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当即达成合办协议。1990年8月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办。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厦门大学举行。

编辑部为了提倡海关史的研究，在1991年第2期的《历史研究》上，特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海关史的文章，其中包括我的《从总税务司职位的斗争看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夏良才的《海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两文，还附了薛鹏志的《中国海关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这期《历史研究》突出了中国海关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尽了倡导的责任。

从上述一系列的事实看来，我的近代海关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鼓舞和

指引是分不开的。我殷切希望编辑部继续不断地带动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推动学术争鸣，把历史研究推向更高的台阶。

学习《历史研究》注意质量问题

胡厚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研究》1954年2月创刊，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编委会18人，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和史学大师陈寅恪、陈垣、汤用彤，就连尹达、向达、杜国庠、吴晗、季羨林、胡绳、夏鼐、稽文甫、刘大年等，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届的学部委员，几乎代表了我国全国第一流卓越的史学家。

1984年编辑部编了1954到1984年《历史研究》30年的论文目录，那里边不少都是高水平的文章。

近些年来，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安定团结，又出现了一大批中青年的史学家，朝气蓬勃，著作很多，质量不错，非常可喜。但是目前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刊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少数作家“诱于势利，求其速成”的情况，还是有的。

前些年，日本汉学家井上清教授来北京，我们史学界在北京饭店欢迎他，举行座谈，他曾说，日本今天的年轻汉学家不如老一辈汉学家踏实。因为今天图书馆有大批的工具书，像目录索引，辞书类书，资料汇编，又有复印机、电脑等等，太方便了，不用再读原书仔细钻研，就能著书立说写文章，所以不如老汉学家深入精湛。回想我们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记得1987年我应邀第二次访问日本，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演，然后《读卖新闻》社又为我们召开了一个对话会，由日本甲骨学会会长松丸道雄教授提问，我作回答。他第一个问题说，“1899年甲骨文开始发现，到甲骨文发现50年的时候，胡先生写过《五十年甲骨文材料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录》，还写过《五十年来

之甲骨学》，董作宾先生也写过《甲骨学五十年》。我那时候才开始学习甲骨，到现在甲骨文研究有了极大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由胡先生主持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出版，使今天的甲骨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飞跃。请问胡先生你们那时研究甲骨，与今天研究有什么不同”。

我回答说，很不同。六十年前，我在大学刚学习甲骨文时，情况虽然也很活跃，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材料问题。1904年孙诒让作《契文举例》，所根据的材料才一本《铁云藏龟》1058片。到1934年我大学毕业时，孙海波作《甲骨文编》，所根据的材料八本书，才6417片。以后材料陆续发现的多了，但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所藏，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利用。对青年学生来说，书印的少，卖的贵，图书馆藏书，又不一定齐全。只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进行一些研究。

后来我进了中研院史语所，先发掘殷墟，后整理殷墟十几次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字，条件总算不错，但对其他公私所藏，不得而知，对国外所藏，所知更少，也还是难于进行总括的研究工作。

今天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国内国外公私所藏的十几万片甲骨文资料，基本上大部分重要的都已发表，材料多了，人员多了，研究论文多了，参考资料多了，资料汇编多了，工具书也多了，一切的一切，都方便的很多了。重要的文章，的确出了不少，令人极为钦佩！

但毫不讳言，像井上清教授说的那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我们有的学者，因为用材料方便了，再加上另外的原因，就东抄西抄，人云亦云，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的论著也就有了不少。

上海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龙讲疏》中恳切谈到“当前文风中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曾说，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戒，杜绝流传”。

王教授谈的是文学界的问题，其实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界也都是这样。这些年来，关于历史考古方面的论著的确很多，但必须指出，也有不少论著，最严重的是质量问题。

最近有学者向我们指出，并用红笔划出范围标记，在某一刊物上某一篇文章，其引证和论点，甚至大段大段的原文，都是抄自我的和齐文心同志的两篇文章，这样的文风，是不是也应该“痛加惩戒，杜绝流传”呢？

请让我再举古文字学的一例，美国白瑞华所校方法敛牧师所摹《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1935年12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白瑞华英文序言及汉译。几十年了，最近有人接到美国寄来白瑞华序言英文复印本，可能以为是从未发表过的稿件，就马上加以汉译发表。其实原书序言既有英文，亦有汉文，没有必要再作翻译。译

文标题“甲骨卜辞序言”，其实序言的原书名叫《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称“甲骨卜辞”，对研究甲骨文的人来说，容易造成误会，以为是否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之外，另有“甲骨卜辞”一书。译文是否确切这先不说，只其中“Royal Scottish”本是“苏格兰皇家博物院”的简称，与“Carnegie”为卡内基博物院的简称一样，现译为“科亚尔·斯克蒂什”这就有些可笑了。我想译者可能没有见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这本原书吧！

我还见在一本书上，刊有编译李济著的《殷代手工业及其装饰艺术》一文，其书目及篇目上在“李济著”前都加（美）字，在文史考古学界谁不知道李济是中国考古学前辈大师，从清华研究院执教出来，一生都在中研院史语所作考古组主任，临终还主持《中国上古史》的编纂，译者难道还认为他是美国人么？

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总之，在今天学术极为繁荣的形势下，还必须考虑学术质量问题。

《历史研究》40年来一直是历史学界权威性的刊物，在庆祝它4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它今后在巩固并发展这一高质量的水平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使我们史学界把它作为认真学习的榜样。

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

金 冲 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种说法相当流行，朋友之间也有出于好意而如此规劝的，以致本来有志于此的学者想一想也踌躇起来，或者望而却步，不敢轻于一试。如果要批评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得更多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都公开地发表。这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

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吧？

但反过来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后代人就没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了？难道只有他们的论述才是真实可靠的？显然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人没有在他准备论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里生活过，无法直接地观察客观事物如此众多的侧面和复杂的演变过程。他们进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或者再加上一些实物资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作出判断和论述。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也难免存在弱点：

第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人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等，未必都在文字资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不言自明而没有人把他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就是作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时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笔，同那时代相隔较远的后人要作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是同今天有巨大变化的，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以为事情应当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中间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国外的人要去详细地议论外国的事情，在熟悉情况的人听起来，有时就觉得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即便当年留下一些文字记载，由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还难说。

我想起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他以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为例，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近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包括全景、局部和各种细部，你看了也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去站上五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柏格森哲学中过于强调直觉而贬低或排斥理性分析的偏颇，这里不打算去作分析，但这个例子可以给人以启发。过去留下的种种史料，有如使人看到一百张关于凯旋门的各式各样的照片，而历史研究者面对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凯旋门前还有可能去重新站上五分钟，后人对早已逝去的历史却无法再到那个环境中去重新过上五分钟，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有时就难说了。后代对前人历史的议论，自由倒很自由，可以没有什么忌讳，不受多少束缚，但往往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容易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这对后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

作了这一番比较以后，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人也好，后人也好，其实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

我再举一个例子。据说世界上的拿破仑传记，重要一点的有上千种，人们决不可能把它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最新的。最早的大体上是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能反映出近两百年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之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去看它，除

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因为常有人非议当代人写当代史，我想再极而言之地说几句。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动的，今天是最新的，过多少年便不再是最新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替代它。可是，“最早的”却是不变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因此，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至于总结较近的历史经验所独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就不消再去多作解释了。历史终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真正在一时还不便公开发表的内容其实也很有限，真正深入作了研究以后，就会发现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多。当然，有如前面所说，当代人毕竟还是有他的那种“时代局限性”，这是客观事实。决不能以为只有自己的著作才是最好的，甚至以为这就是“千古定论”，决没有那回事。许多重要的历史课题，往往后人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去重新研究它，写出新的著作来，并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当代人所写的，但肯定也有许多方面不如当代人所写的。这大概也是客观事实。

最后还是回到前面说过的话：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相互不能替代。这篇笔谈，目的是支持当代人写当代史，因为在目前这也许是更需要强调解释的，所以对这方面多说了几句，自然并没有想贬低由后人来研究今天历史的那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意思。

谈历史学与现实

夏东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我既是它长期的读者，也是广大作者中的一员，当然义不容辞地应该对其过不惑之年表示祝贺。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以往的人和事及其发展过程，也即所谓历史。作为过去的

历史是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但作为认识、研究和反映历史规律的历史学，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学之所以不断发展变化，是由于现实在时刻变化的缘故。现实变化，就会影响到历史学发展变化，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因为，现代人去研究人类过去的事情，研究过去人们的活动，不可能离开现代的实际和认识，这是一。其次，现代人去研究历史，不是为过去而研究它，而是为了今天去进行研究。以对今天现实的认识去研究历史并“为了今天”二者，构成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我对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夏氏箴言手册》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不为现实服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在阐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如果从表面看史学同现实发生矛盾，毫不犹豫地服从科学。“服从科学”往往能更好地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与现实关系最基本的一条；二是坚持科学性，也即上述今天对现实认识和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现实不断发展，人的实践和认识也随之发展，对历史的认识也必然发展和提高。

众所周知，人类探索和研究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奥秘或问题，以及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今天或是明天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生活更为美好，这也就是说，所有科学都要为现实服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概莫能外，历史学当然同样要为今天。如果不为现实服务，以往的事要化力气去研究干什么！所以我有“不为现实服务就没有存在价值”的断语。

历史学既必须为现实服务，那么，是否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呢？曰否。现实对于史学工作者起到启发作用，例如，对历史上许多事情，过去的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经过现实的启发，对其重要性意识到了。拿林则徐、魏源在150年前所说“师夷长技”的话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包括史学工作者）对此远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意义，讲课写文章往往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甚或还批判其“师夷长技”不过是为了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不足取。这，有的不一定是心里真话，因为强调“师夷长技”意义，有被扣上“单纯技术观点”和“反对政治挂帅”乃至崇洋媚外的危险。改革开放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把发展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力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了，再回过头去看看“师夷长技”一语的提出，颇觉林、魏的大胆卓识高明无比，且对此很有新鲜的感觉。而对于把“师夷长技”正式提到实践日程、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重新加以评价，将其提高到一定的历史地位，就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现实对于史学工作者，只是起启发作用，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正确的原则和态度，应该是从现实得到启发之后，去进行研究时，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因为如果从现实出发研究问题，势必按照现实的需要去剪裁史料，并迁就现实的需要去阐

谈问题，例如“四人帮”时的一些人为篡党夺权而移花接木地乱事搬动史料，或如将洋务派比作所谓“走资派”，牵强附会地把李鸿章作为“尊孔读经崇洋卖国”的典型代表人物来批判。“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不过是为了“影射”而胡说八道而已。如果在现实启发下从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就不会迁就某种政治需要裁剪史料和乱说一通。所以“启发”与“出发”仅“启”与“出”一字之差，却有原则的区别。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在阐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根据我的经验，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历史规律的作品，有与现实政治合拍的，也有与现实政治需要发生矛盾的。如上所述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头等重要的条件下，大谈“师夷长技”的伟大历史意义，那是合拍的；但“发生矛盾”的事例也不少，如果“发生矛盾”，又怎样理解“为现实服务”？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1958年中国大搞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时，我正好在讲《天朝田亩制度》。我按照科学性原则，在肯定其革命性同时，强调说明其平均主义的分配等规定，必然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破坏生产力、挫伤群众积极性等的反动性。这种讲法是科学的，但与当时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做法是矛盾的，与政治气氛是不协调的。当时听我讲课的人除充分肯定我的理论分析正确性之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对农民阶级的思想加上‘反动性’，感情上受不了”；二是“照这样讲如何理解人民公社？”我的答复是：“反动性”不是我的发明，是列宁对平均主义的评语；至于“如何理解人民公社”？这个“人民公社”四字，我没有提到。意思是“如何理解人民公社”是听众的事。气氛虽有些紧张，却能平安无事过关。

我通过这件事，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它说明了，按照科学办事，能够启发听众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公社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了。至少他们把《天朝田亩制度》同人民公社二者的平均主义在脑子里“打起架”来了。这就是社会效果。这种效果，表面上与现实政治需要是矛盾的，但既引起听者思想上的矛盾与思考，这就表明，或是对人民公社的做法有看法，或是对我的《天朝田亩制度》讲法有看法，或者对二者均将信将疑。但据前所说，听者是在“充分肯定我的理论分析正确性”前提下提两条意见的，这表明对人民公社的做法有异议的可能性更大些。这样，史学的坚持科学性发生了良好的影响与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是被否定的。由此可见，坚持史学的科学性，与现实政治发生矛盾或不协调，归根到底仍是为现实服务，不能短视眼式的与现实政治“对号入座”才算服务。如果为了迎合人民公社需要而把《天朝田亩制度》平均主义讲得很好真如“天国”，以与人民公社的错误“对号”，那是损害科学，那是史学的耻辱，必将为正直的学者所不齿。所以为了避免误解，我只提“为现实服务”，不用“为政治服务”一词。可见我的如下提法是正确的：“如果从表面看，史学同现实发生矛盾，毫不犹豫地服从科学。‘服从科学’，往往能更好地达到为现实

服务的目的。”

写到这里还要澄清一种含糊不清的提法，即所谓“科学性与政治性统一”。这句话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说，很容易误会。如上文所说科学性与现实政治矛盾，那就不统一了。“不统一”而强求统一，就有牺牲科学适应错误政治的危险。如果照上文《天朝田亩制度》与人民公社的事例看，它们有矛盾，但结果证明坚持科学性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认为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统一”，但那就太转弯抹角和“深奥”了，一般是很难说清楚的。因此，我认为“科学性与政治性统一”一句话，对历史学说，以不提为宜，因为很容易误解为与现实政治需求“对号”，势必常常忽略科学性。《历史研究》40年来，在坚持科学性、不强调与现实政治“对号”但又能“为现实服务”方面，堪称一流的杂志，期望今后做得更好。

历史学需要与发展学结合

庞卓恒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二战”结束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走上民族独立和奔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西方国家面临着在经济和政治的战略策略上怎样对待这个新兴的“第三世界”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末开始出现主要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此后又相继出现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学科。这些学科都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所以又统称为“发展学”或“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

西方的发展学已走过30余年的历程，虽然至今还面临众多困境，但毕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切近观之，他们的成果大都值得历史学借鉴，所面临的困境也值得历史学认真思考。

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从广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发展学。它与当代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似乎在于，前者主要研究过去的社会发展规律，而后者主要研究现实中的社会发展规律。

现实本来就是历史的延伸体，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互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发展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对这些社会进行“人体解剖”；历史学研究过去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可说是对社会作“猴体解剖”。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互相衔接、互相补充和相得益彰的关系。

发展学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怎样从传统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其中包括怎样从传统农业与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发展为现代产业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样转移到非农产业，怎样实现城市化，人口、资源、内外贸易、国家政策、传统文化、国民教育和文化素质等因素对发展进程的影响，传统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怎样向现代转化……等等。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有些现象和过程早已在历史上开始出现或开始萌动。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那些现象和过程开始出现或萌动以后的历史进程，却各不相同。有的比较顺当地发展下去，有的则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进度迟缓，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异？其中有没有共同的规律性？历史学家在求解这些历史之谜时，可以从发展学得到某些启发。

例如，我们确信人们生产能力的发展是推动整个历史进程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怎样估量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速率？怎样分析发展速率缓慢的根本原因？这些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课题，可以从发展经济学中获得某些求解和启发。

发展经济学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是衡量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以大量实证数据证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与人均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人口增长率、平均寿命、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都存在着相关关系。我觉得这些标志也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标志，可供历史学家借鉴，用以估量历史上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固然，历史学家在这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统计数据，特别是系统的统计数据。但我们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变通办法。例如，研究上古中古史，要对某个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哪怕是做粗略的估量，都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设想，既然上古中古社会都是以小生产农业为主的社会，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零散数据尽可能详尽地搜集起来，运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处理，筛选或加工出代表性的数据，用以估量该社会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估量该社会某个时期的农产品总量，再把农产品总量换算为热量单位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进而探寻人均占有热量与该时期的人口波动、平均寿命、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的消长等变量的相关关系。这样估量的结果，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都能促使我们去进一步追寻其中的原因，而这就会促使我们一步步逼近发现其发展演变规律的门径。又如，发展经济学有一个估量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著

名公式，即哈罗德—多马模式，其简化方程为 $G=S/K$ ，其意为国民经济增长率 G 等于储蓄率或投资率 S 除以资本/产出率 K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储蓄—投资率越高，增加单位产量所需的资本投入量越低，该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反之，其增长速度就必然较低。它启发我们怎样去估量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速率及其差异的程度，并进而探究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古中古社会，绝大多数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民家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估量有一定代表性的农民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减去其全家一年的消费量，再减去其必须交纳的地租和各种赋税，从而估量出该农民家庭一年可能有的净余率。这个净余率，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在一般情况下就可视为该农民家庭的储蓄—投资率。农民家庭经济一年收支的净余率的多少，储蓄—投资率的高低，与农民拥有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农民与官府和地主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地租和各种捐税负担的轻重程度、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以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都有密切关系。这就促使我们对所有这些相关变量都要加以考察。估量农民家庭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要具体考察农民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为获得一定的产量，需要投入多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能不能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取得较多的产量，取决于农民的生产能力、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勤劳程度以及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在估量农民家庭经济的资本/产出率时，也需对这些相关变量加以考察。运用方程式 $G=S/K$ 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年净余率和储蓄—投资率、资本/产出率、年增长率的估量，也就是对农民生产力的具体衡量。如果我们对一定数量的农民家庭经济所做的个案估量，其代表性具有足够的覆盖面，就可由此对某个农业社会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速度做出某种估量。尽管所有这些估量都不可能很准确，甚至可能很不准确，但这些种估量较之单纯的定性判断，毕竟前进了一步，也有较大的说服力。

以上我们仅以上古中古史的研究为例，略举数端，说明发展学对历史学的借鉴和启发意义。至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供历史学吸取的方面更多了。这首先是因为近现代史料中含有的各种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这就为近现代史家运用发展学理论和方法作计量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天地。例如，对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产值或其替代变量、对某个社会一定时期的 G 、 S 和 K 的数值，可能做出与真实情况吻合度较大的估算。此外，还可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方法估量各产业部门发展的均衡或不均衡程度，运用洛伦兹曲线估算衡量社会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从而估量与此相关的社会稳定程度，估量不同阶级和阶层人们的生活质量，估量国民识字率和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等等。

可见，历史学家如果把发展学的积极成果吸取过来，必将促进历史学走向跨学科研究的新境界，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如再进一步，将历史的发展研究与现实的发展研究贯通起来，就可能开拓出作为基础科学的历史学与应用性软科学直接交叉汇合

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我们在吸取发展学的成果时，也要看到它本身的局限性。西方的发展学虽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至今也还远未完善。如一位西方发展学家曾说：当今的发展学几乎对每个发展问题都作过回答，但每个回答本身又成了问题。笔者认为，西方发展学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他们难以回答什么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究竟有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他们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使他们难于突破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归纳逻辑的局限。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历史观问题。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有批判、有选择地吸取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检验其是非得失，不但有利于促进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发展学的发展。对此，我想，发展学家们也会赞成的。

展望二十一世纪史学的一点浮想

罗荣渠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创刊 40 周年，是值得庆贺的大事。特别是想到 40 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艰难历程，则可以纪念之事尤多。

40 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想当《历史研究》庆祝它的 50 周年时，世界将跨入 21 世纪，那时中国历史学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不禁浮想联翩，特略进数言以为祝贺助兴。

不才深信，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将发生目前难以预见的变革。伟大的变革时代必然会引起或召唤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历史学）的变革。当此世纪交替之际，我首先想社会科学的变革肯定会加快步伐。

就历史学而言，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中国具有最悠久的传统与举世无匹的遗产。但几千年来中国史学都沿着治乱兴衰的政治史传统发展，用史鉴以资治道，是自太史公以来传下的“家法”。只是到近代西方史学传入之后，引进社会进化论的新史观，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进入中国史学，同时中国史研究也被纳入世界史发展的总框架，这样，中国传统史学才开始了向现代史学大转变的过程。

但必须指出,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社会科学与新史学本身也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史学新体系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产物。它以西方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的分析概念与方法都是西方式的。当时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是透过“东方学”一类的狭隘的孔眼进行观察的。因而是相当贫乏和肤浅的。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已大变,第三世界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前台甚至中心,它所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广阔国土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材料,是19世纪以来建立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所难以包括的。甚至像西方经济学这样冷冰冰的严格的经验性科学,它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较经济学的兴起提出了西方经济学与非西方经济学相关的一系列新课题。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本身也经历过几次重大变化,西方社会科学其他各门学科的趋势也是如此。

这里有必要提到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的新趋势。这是近几十年微电子技术兴起后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别的不谈,单是运用电脑进行计量分析的方法被引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就引起了近年科研选题内容的重大变化。据我在台湾与香港所见,那里的史学工作者已把二十四史输入电脑;只要按动键钮,就可迅速检索出二十四史中有关某个典故、语词、人物、事件等全部资料。其功效是多少位皓首穷经的学者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的。新科学研究手段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据最近的报导,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与道格拉斯·诺思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就是运用计量方法和统计模型等手段,独辟蹊径,在美国经济史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成果。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进入史学领域,理当引起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跨学科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是近20年来才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它拓宽了历史学的边界,并提出了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如世界人口发展趋势比较,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历史根源问题等等。有人称之为“宏观历史学”,也有人提出建立“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的构想,都说明历史学的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不断在拓宽。

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过“通古今之变”的卓见。处在今天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如不通今之变,恐怕也很难通古之变。这就是我的一点浮想。

《历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史学论坛的一块宝地,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现代化与走向世界做了许多工作,但也还有许多新工作可做。如何使刊物上的论文更加合乎科学论文的国际规范,就是一件切合实际的工作。例如,多年来我们刊物上的有些论文只注明原始资料的出处,而不注明引用与参考过的史学专著和论文的出处,这使读者很难了解论题已有的研究状况;尤其不利于学术信息的传播,仿佛所论的问题现在中国与世界都从未研究过。又如,有的论文只注明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引用的论点,而不注明引用与参考的其它文献论点的出处。在刊物上发表的有些外国史论文注脚中,只

告之读者所引外文原著的中文译名，而不附原文书名和作者名，从而使读者无法检索原书。这些都反映了过去学术研究中残留的某种封闭性与落后性。至于有的论文之所以不说明时人论著，如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回避，恐怕就难以解释了。这些看来都不符合现代学术著作应有的规范形式，都应加以改进。这比在刊物首页增加一份英文目录，似乎更有助于学术国际化。以上就算是祝贺之际提出的小小建议吧。

《历史研究》四十年

宋德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审)

《历史研究》杂志从1954年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路程。它在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同新中国史学一道成长，与社会科学事业同步前进，它的历程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共和国的政治风云。

1953年秋，正值新中国初期的革故鼎新、百废俱兴之际，党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并组成了由郭沫若做召集人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为创办这个杂志，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1956年，他又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尔后，“双百”才成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与学术的总的指导方针。

四十年来（“文革”期间除外），《历史研究》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不断前进的。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4年2月创刊到1966年5月停刊。

这是新中国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也是《历史研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史学界先后就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关于前五个问题的讨论，被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历史研究》即是开展史学争鸣

的一个重要园地。上述问题的讨论，有的是《历史研究》首先发起的，有的是由它的参与而开展起来的。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指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讨论，是由1950年3月19日、21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和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为其开端的。后来，郭沫若又在《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把这个问题的争论再度推向高潮。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主要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其中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束世澂、徐中舒、王玉哲、李埏、唐兰、吴大琨、田昌五、黄子通、夏甄陶、侯外庐、日知等著名学者的文章，都是在《历史研究》发表的。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则是随着《历史研究》的创刊而开始的。侯外庐在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一反以往通行的中国封建土地的地主（或领主）土地所有制说，首倡“皇族所有制”说。此后，史学界就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亦即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所有制还是地主所有制问题展开了讨论。从1954年到60年代初，《历史研究》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侯外庐、杨向奎、李埏、束世澂、韩国磐、蒙默、孙达人等学者的十多篇文章。

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包括农民战争与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与平均思想，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既是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研究中争论的热点之一，也是《历史研究》刊发论文所用篇幅较多的问题，先后发表了侯外庐、白寿彝、贺昌群、蔡美彪、戎笙、宁可、孙祚民、史绍宾、郑昌淦、胡如雷、田昌五等人的文章。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首先对汉民族形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揭开了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序幕。

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主张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因而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后来，《历史研究》又连续发表了荣孟源、黎澍、刘大年、金冲及、孙守仁、戴逸等人的文章。虽然各家意见不尽相同，但是胡绳的主张基本上为史学界所接受。

在这个阶段里，《历史研究》编辑部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62年）、《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推动和配合了史学界百家争鸣局面的展开。

五六十年代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国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进而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新中国史学的凯歌行进时期。《历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毋庸讳言，在这个时期里，我国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与运用还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有着那个时代的“左”的痕迹，这也必然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反映。尽管如此，《历史研究》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公认的。

第二阶段：从1974年12月复刊到1976年。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经过一番筹备，《历史研究》于1974年底复刊。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研究》也无例外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留下许多值得深思和应该汲取的教训。

第三阶段：从1976年到现在。

随着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十年动乱”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社会科学的春天，《历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本阶段的头两年时间里，《历史研究》为清理“十年动乱”给我国史学研究造成的危害；为冲破“禁区”，解放史学；为按照史学本身内在规律来对待史学，做了一些工作。从1979年起，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历史研究》也大致完成了重归学术刊物的过渡，步入了正轨。而从1980年由月刊改为双月刊起，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比较稳定的风格。

在这一阶段里，《历史研究》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是推动“文革”前若干历史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开展。

1978年10月，《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两家杂志社在长春联合发起召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继续就五六十年代史学界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开展争鸣。这是在十年文化禁锢之后召开的首次史学学术讨论盛会，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其意义大于讨论会本身所取得的成就。此后，《历史研究》又发表了何兹全、金景芳、侯绍庄、王思治、马克垚等人的文章，使有关各说观点有所发展，更为充实。其他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历史研究》都有文章发表，反映了史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新进展。又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洋务运动问题等，先后发表了李时岳、陈旭麓、章开沅、张海鹏、戚其章、汪敬虞、夏东元等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标志着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新领域的开拓，是近十多年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社会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尽管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出现了一些有关社会史的论著，但在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甚少。

为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研究》自1987年起,先后与其他学术单位联合召开多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及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就有关社会史的学科建设及若干具体问题开展讨论。《历史研究》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探讨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方法、意义和关于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阶级与阶层,人口与移民,习俗与风尚等方面的文章以及有关社会史研究状况的综述。

其中,特别是对阶级与阶层研究,做了较多的工作。早在1980年,胡乔木曾向《历史研究》编辑部建议,组发全面论述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发展史的文章。1983年10月,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召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后结集出版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随着新时期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重新评价与深入研究,对资产阶级的研究也更加客观,有了很大进展。《历史研究》就此重点组发文章,并与其他单位共同主办两次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编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1986年)。《历史研究》还参与主办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与主办单位编辑出版《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尽管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不久,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个案研究亦须更上层楼,并且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还有不同的评价,然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发展,必将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关于民国史的研究,过去虽有所涉及,但将其作为断代史来研究则是近十多年的事情。外国史方面,关于西欧、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历史研究》就上述问题组织编发了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章。

第三是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探讨。

近十多年,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历史研究》也就此发表文章,开展讨论。(一)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1984年第5期发表了黎澍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也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所有的人都在既定条件的制约下参与了历史的创造。黎文的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论。这是在新时期由《历史研究》引发的一次学术讨论(虽然前此于1980年一家大报上有人就“奴隶创造历史”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但反响不大)。此后,《历史研究》又刊登了刘大年、吴廷嘉等人的文章以及关于这个问题讨论情况的介绍,反映了目前存在的不同见解。(二)关于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评介研究。《历史研究》刊发的评述外国史学观念、方法、流派和发展趋势的文章,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开阔视野,以收“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以上就是《历史研究》走过的历程。

《历史研究》从1954年到1966年，由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1974年复刊后，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

《历史研究》自创刊到1993年底，共出版226期、载文3000多篇，约5000万字，目前每期总印数一万五六千册（1993年）。发行范围，除遍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外，据不完全统计，还远达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朝鲜、越南、印度、新加坡和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历史研究》编辑部还于1979年编辑出版《历史学》季刊一至四期。同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以《历史研究》编辑部为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两刊，《历史学》出版四期后，宣布停刊。

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厚爱。在纪念《历史研究》三十五周年专号（1989年第5期）上，几位著名学者说：

——“我们这个刊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总起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季羨林）

——“《历史研究》是全国性大型刊物，它的影响大，责任也大。”（杨向奎）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史学研究的实际对象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在这种成就中，也有《历史研究》的功绩”。《历史研究》“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它站住了，发展了，壮大了，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有水平的刊物”（任继愈）。

——“《历史研究》经过曲折的道路，不仅已在学术界站住了脚跟，而且为国内外公认为我国最有权权威性的历史专门刊物，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蔡美彪）

有关统计数据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历史研究》的肯定。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据载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综合分析和学科专家鉴定五项要素，认定全国历史类核心期刊32种，而《历史研究》居第一位。

对于人生来说，四十岁已届“不惑之年”，然而在《历史研究》四十周年时，我们作为它的编者，对如何办好刊物还难免有些困惑。《历史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住已被学术界认可的水平与风格，又能有所创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改变了以往的风格，便不再是《历史研究》；倘若没有创新，就不能与我国历史学同步发展，更不遑论学术刊物应开风气之先了。不过我们深信，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研究历史的编辑方针，执行“百家争鸣”政策，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依靠作者、读者、编者的通力合作，迎接挑战，《历史研究》就一定能够继往开来，为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敬告作者

鉴于人力、财力有限，退稿负担过重，本刊再次申明：
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凡四个月内未收到稿件采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大力支持与配合。

《历史研究》编辑部

1994年1月
